

《青峰》与新时期房山文学的繁荣

刘泽林

早在《青峰》停刊的时候，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，但迟迟未能动笔。先是源于文人的理性，料知《青峰》停刊未久，彼时记述，难免会写出些心中的不平来；待到后来，心绪平复如常了，却又看轻了文字，淡了梳理的心思。当然也有懒惰的成份：十多年的出版历程，各阶段编者的不同风格，房山文人与它千丝万缕的关联，等等，要理清这些东西，需要耗费多大的精力！对于一向疏于史料的我来说，写起来无疑难度更大。这期间，心里当然也存了一分侥幸，希望房山的哪个文人会写出一篇记述《青峰》的文章来。但仔细一想，我是《青峰》的一任主编，且时间最久；前两任主编一位已经离世，另一位也年岁已老，那还能指望谁呢？所以，还是老老实实写吧。头绪繁多，且慢慢道来。

《青峰》的三个编辑阶段

《青峰》的前身《房山文艺》系文化馆主办，由赵日升于1974年创刊并主编，16开本；出版三期后，1978年6月第四期始，改为报纸型，8开4版；1981年6月，自总第28期始，更名为《青峰》，由王凤梧主编；房山县文联成立后，王凤梧创办、主编《大房山》报，《青峰》由我主编；1992年7月2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。《青峰》(含《房山文艺》)从创刊到停刊，经三任主编，历时18年，共出版67期。

赵日升与《房山文艺》

说《青峰》便不能不提《房山文艺》，因为《房山文艺》是《青峰》的前身，或者说也可以说《青峰》是《房山文艺》的延续；说《房山文艺》便必须要说赵日升先生，因为他是《房山文艺》的主要创始人，因此也便可以说是《青峰》的第一任主编。

赵日升，诗人、编辑家，笔名月恒、曾翼人、了之，1938年11月4日出生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次洛村。1952至1955年，在房山中学读初中时，即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。1955年考入通州第一中学（即今潞河中学）读高中。这所学校学风甚好，中国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经在此就读，并少年成名，步上文坛。袭此遗风，学校在文学方面，气氛尤为浓厚。赵先生投师该校，显然是对它的文学

氛围极为看中。就读期间，他陆续给报刊投稿，小说、散文、小品、诗歌等均有涉足。1956年第2期《河北文艺》发表了赵日升的处女作《谁能猜得着》，从此便专意写起诗歌来。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(现首都师范大学)中文系，在校四年间，诗歌创作愈发精进。1962年，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县琉璃河中学任教。1973年调入房山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。

在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有七、八年的时间，但从房山整体的文学发展上看，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。对赵日升个人来说，除了诗歌创作，从此又踏上了一条文学辅导之路；对于房山的文学创作而言，从此便掀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。在此前至1949年这段时间，房山虽然也有可以圈点的文学创作，甚至王凤梧更因几篇杂文而被错划“右派”，但那终究都是零散的个体行为。文化馆虽历来推崇文学创作，但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旗手。所以，调赵日升到文化馆，主要看中的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成就。赵日升在文学创作组工作期间，开始致力于房山文学队伍的打造，组织起了几十人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，到他调走时，已经有上百人之多了。为了使业余作者有展示作品的平台，赵日升几经努力，于1974年，创办了16开本的《房山文艺》；出版三期后，为快捷、经济考虑，从1978年6月第四期开始，改为报纸型，8开4版，每月一期。《房山文艺》的创办，为房山的业余作者开辟了房山县第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，促进了房山文学作者的成长和文学事业的发展。那一时期，受时代所限，房山的文学创作虽然整体水平不高，但业余作者队伍的快速扩充，为十年后房山文学的崛起培育了一片沃土。

所以，客观地说，现在房山文学呈现的一片繁荣景象，赵日升无疑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；而《房山文艺》，自然便是当代或新时期房山文学的摇篮了。

1980至1982年期间，赵日升借调至《诗刊》杂志社工作，1982年，正式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工作。其中一段时间，董华独自编辑《房山文艺》，虽无主编之名，却是实实在在的执行主编。1981年，王凤梧调入房山文化馆，接任《房山文艺》主编。

王凤梧与《青峰》



王凤梧，1927年生，房山饶乐府村人，做教师时，因两篇杂文被划成“右派”，也算是“文革”前房山文学少有的成就。“平反”后赋闲在家，等待落实政策、恢复工作。恰其时，赵日升与文化馆领导访邀，遂于1981年到文化馆创作组工作，主编《房山文艺》，董华仍是执行编辑。赵日升遂安心到《青年文学》就职。自此，房山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

1981年6月，自总第28期始，《房山文艺》更名为《青峰》，不定期出版，刊名由董华约请著名诗人

张志民书写。在这里，任何有关《房山文艺》与《青峰》名称优劣、是否有何玄机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在第三任编者看来，《房山文艺》更具地域性，一看便知刊物等级；《青峰》则含混了区域的概念，但其内容依旧是房山本色。据凤梧先生说，取意《青峰》，旨在扶植更多文学新人，绝无否定《房山文艺》之意。当时，凤梧先生还声若洪钟般诵了两句注释“青峰”的诗，可恨日后被我忘得干净！此后，我多次见到日升先生，也从未见他对更名一事有什么介怀。可见，《房山文艺》更名为《青峰》实在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。

诚如凤梧先生所言，更名后的《青峰》更加注重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培养。

此时的房山文学，正孕育着第一次腾飞。改革开放后，长期禁锢人民的“极左”观念逐渐淡出人的思想，文艺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提高，全国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，进入了全面的文艺复兴时期。和时代同步，房山的文学事业也进入到了春满大地、百花争妍、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。与《房山文艺》的办刊宗旨同脉，《青峰》自觉地承担了房山文学创作主流基地、房山业余作者成长摇篮的历史责任。在《青峰》不断吹响的文学号角声中，一支业余文学创作大军迅速向当时房山唯一的文学载体集结，几年间便激增到 300 多人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时文化馆请刘绍棠等著名作家来房山讲座，我发出去 200 多个通知，结果前来听讲的作者把一个能容纳 300 人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，那境况绝对是空前绝后了。

《青峰》不过是一个很小的“摇篮”，如何能够容纳得下那么多文学新人？凤梧先生便对那些有潜力，且已经在“摇篮”里培育了一段时间的作者下了“逐客令”：到公开报刊上去闯荡吧，好腾出版面给更多的新人。但凤梧先生绝对是要“送一程”的：先是精心帮这些作者润色出一篇好作品，然后亲笔写一封信，连人带作品，推荐到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去了。鉴于当时房山文学的创作水平，上大刊大报显然不够现实，而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是距离北京郊区作者最近的报纸。我这么说绝无贬低《郊区版》之意，恰恰相反，我认为在扶持、发展北京郊区文学创作方面，《郊区版》功德无量。于是，房山作者开始陆续在《郊区版》上崭露头角，且占据的版面越来越大。随着凸凹、陈玉泉、张文玺、王刚、李艳梅等新秀名字的不断出现，尤其是王刚、孙艳玲、王文玮三名年轻的作者同获“北京市建国三十五周年征文”奖，在北京文坛引起轰动，被评论家称为“北京西南文学现象”，由此掀起了房山文学崛起的第一个高潮。与此同时，房山掀起了一股办报热潮：时任房山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玉泉创办《房山人口报》，凸凹主持《房山政协》报，卓成栋主编《房山矿机报》，一时竟有五、六家闪亮登场，甚为壮观；虽都是行业报纸，但均辟有文艺版，专发房山作者的文学作品，极大地缓解了《青峰》的版面和出版周期的压力。所以，梳理房山文学发展的脉络，这几家载体不能忽略不计。

在推进房山文学创作的同时，凤梧先生宝刀不老，笔耕不辍，短短几年间先后在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数十篇，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，成为北京郊区的代表性作家。

所以，如果说赵日升先生对新时期房山文学有开创、奠基之功，那么王凤梧先生无疑便是提高、壮大之德了。

1983年底，房山县文联成立，胡振常任主席，王凤梧被选为副主席。1985年胡振常因身体原因，辞去文联主席一职，房山县委决定由王凤梧继任主席。同年，已经退休的王凤梧创办、主编《大房山》报，《青峰》的接力棒便传到了我的手里。

《青峰》的终结

我与《青峰》结缘是在1982年下半年，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，我极偶然地得到了一张8开4版文学报纸，上面散发着浓郁的家乡气息，细看出版处，果然是房山文化馆主办。那便是《青峰》了。这一次偶然的机缘，无疑改变了我工作的取向。年底的时候，我携了一篇习作敲开了文化馆院内的一扇木门，迎

面端坐在一张木椅上的是一位粗胖的老者，那便是凤梧先生。

几番访谈之后，凤梧先生对我说：“到《青峰》来吧。”于是毕业后我便选择了到文化馆工作。我想，当初赵日升先生邀凤梧先生的时候，说的一定也是类似的话：到《房山文艺》来吧。由此看来，《青峰》的编者对它文脉的传递是十分看重的，毕竟聚集在这杆旗帜之下的是一支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。



《房山文艺》报

当时的编辑部有三个人：主编王凤梧，董华和我。这样的人员配置，在郊区文化馆创作组来说，绝对称得上豪华了。因编辑精干，便值得细化分工，在主编终审之前加一道初审。董华自告奋勇揽了奔波印刷厂和校对的任务，那一道初审的工作自然便由我来做了。对此环节，我并不陌生，因为在大学毕业前，我在《丑小鸭》杂志社实习了几个月。一张四版小报，塞满了也容不过两万字，一年出版最多时也不过八期，所以工作很是轻松。但有一项传统“业务”却是极难考核的，那便是接待来访的作者。那时候不像现在这般方便，来稿发个电子版什么的。而距离并不太远的作者，嫌邮寄太慢，多是亲自前来送稿，为得是亲耳聆听凤梧先生的一番指教；而访我的作者，自然是年龄相当者更多一些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日后都与我结下了一定的友谊。

大概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左右，创作组又先后有苏宝敦、邢一中加盟进来。虽然他们未参与《青峰》编务，且停留的时间极为短暂，但这里却不能不提：毕竟他们曾经来过。

1985年，董华到文化馆下属十渡文化站工作，游走山区三乡，另外开辟了

一块文学天地，在京郊弄出了不小的响动。同年，凤梧先生退休，接任县文联主席之职，遂将《青峰》帅印交付与我，自己开创以报告文学见长的《大房山》去了。所以此时的我，说是主编，但几乎就是光杆司令了。

这样也好，我可以实施我的编辑理念了。此前，房山文学创作经两位前辈不遗余力地打造，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但局限也十分明显，即：虽然房山作者创作的作品已经能够冲出房山，但大多只是冲到了《郊区版》的门下，而且绝大部分是“微型文学作品”。我当时认为，这固然与房山的整体实力有关，但房山作品的创作手法过于传统、乡土、单一，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。于是，《青峰》在倡导房山作者向更高的文学层次（走出《郊区版》，到文学大报大刊上闯荡）的同时，鼓励文学形式、语言、手法、内容等全面的创新，并以一次“夕阳”同题小说”征文，拉开了这场对房山文学影响深远的“文学创新运动”的序幕。成效极其显著：统计显示，此前房山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，《北京日报·郊区版》、《中国人口报》等几家文学档次并不甚高的报纸占据了很大的比重，粗略统计约在百分之六十以上。但到了“文学创新运动”之后的1987年，刊登房山作品的文学园地已达上百家之多，其中不乏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文学期刊。不仅如此，这一阶段的房山文学作品，获奖数量和级别都有显著提高。这表明房山的文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和飞跃，形成了房山文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。

但高峰之后，《青峰》却从1987年开始进入到了风雨飘摇的时期。这一年，文化局领导调我到图书馆，任副馆长，答应我待图书馆班子建设完成后再回《青峰》报。这一段时间，《青峰》因无人编辑，自然停刊。我想，也许在去图书馆之前，我也应该效仿我的前辈，寻一个可接续香火的人，对他说：到《青峰》去吧。待我再次回到创作组的时候，事业单位面临经费压缩，文化馆已经无力出版《青峰》了。这一停便是三年多。虽然在这段时间，我个人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一个丰收的时期，在《青年文学》、《海燕》、《广州文艺》、《厦门文学》等文学期刊屡有斩获；但作为一个编者，终究为《青峰》长期处于停刊状态而心存愧疚。

几番谋划，几经奔波，在成立由十多位房山企业家组成的《青峰》理事会的基础上，《青峰》再一次复生了。为适应时代发展和报纸生存的需要，我对复刊后的《青峰》进行了大幅度变革：在坚守文学报纸的基础上，适度增加了社会焦点、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；并且为今后扩大发行量考虑，将《青峰》投放房山各报刊零售网点发行。当时的我意气风发，绝对是一副大干一场的架势。

但好景不长，《青峰》复刊一年后，领导找我，说上级指示，房山要创办一张区级报纸，为整合资源，要连人带报地收编《青峰》，言下之意，《青峰》自然需要停刊。

记得我还颇为激动地和领导理论了一番，后来才觉得当时对领导有些不礼貌：上级的指示，领导有什么办法？

当时《青峰》还有两位编辑：刘强和王雪荣。虽然刘强后来习了摄影，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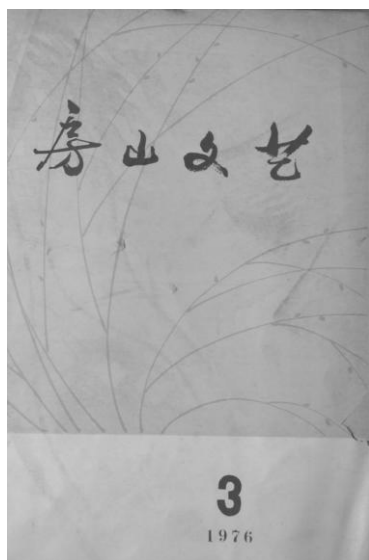
雪荣索性不好写作的行当，但这里却不能不提：毕竟，他们是一段历史的见证；毕竟，他们曾经在过。而且，即使在《青峰》停刊后，他们依然跟随我，一道创办了“青峰文化服务公司”。看这公司的“番号”，当时的许多读者便猜到，我是要走一条实业复刊的路了。可惜，日后的路却走得身不由己，“复辟”《青峰》的念头也愈发淡薄了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我的所为，极似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个人物：一心图谋复蜀而终不能成的姜维。与垂暮蜀汉不同的是，当时的《青峰》正青春勃发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有人说，恰是《青峰》的繁荣，才催生了那张区级报纸。

《青峰》的历史作用

房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，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起步，到 80 年代中期的重点突破，再到 90 年代的广泛丰收，直至现在的全面繁荣，发展可谓迅猛。其间，《青峰》为房山文学创作者队伍的形成、成长、壮大，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，为房山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《青峰》是房山文学创作的策源地。

在《青峰》创办之前，房山的文学创作处于零散的、低档次的状态。除赵日升等少数几人的创作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。《房山文艺》的创办，不仅使房山的作者有了刊发作品的园地，更为他们向更高的文学殿堂迈进搭建了一架



《房山文艺》封面

必要的阶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青峰》是房山作者走向成功的铺路石。《房山文艺》的创办，唤起了房山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，他们自发地向《房山文艺》聚拢，到更名《青峰》时已形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文学创作队伍，为日后房山文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青峰》就是当时房山文学的旗帜。无论自觉与否，作为旗手的《青峰》编者们的创作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山文学创作的氛围和走向。譬如赵日升先生，以诗歌见长，所以当时的作者队伍习诗者众；王凤梧先生擅长小说，所以当时作者队伍中写小说者渐多。我主持《青峰》时，与凸凹、张文玺一同发起的“创新运动”，更是在房山文坛刮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创新之风，现在房山一些实力派作家的文风大多是在那一段时期形成的。从这个现象上看，《青峰》便是房山文学创作的风向标。而《青峰》的编者，在推崇某种创新、倡导某种文风时，总是舍得拿出大块版面，放宽尺度，为此类作品大开绿灯。从这个做法上看，《青峰》又是房山文学的实验田。

《青峰》的历任编者，因年龄和性格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编辑风格：

赵日升先生是纯正的诗人，因而《房山文艺》被营造成一个文学的沙龙；王凤梧先生做过语文教师，因而与大部分作者形成了师生之谊；至于我，骨子里有江湖的豪迈，加之作者中与我年龄相当者甚多，因而最后相处出一大片友情。但无论风格如何不同，在对作者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，那便是：真诚地扶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青峰》的编者绝对是文学作者的良师益友。

《青峰》是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。

从现在房山文学创作队伍的构成，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《青峰》的历史作用。房山作家协会现有会员 90 人，45 岁以上的会员竟占三分之二，而这三分之二的作者大多起步于《青峰》的时代、《青峰》的平台。

另一组数字也许是更好的说明：在 1980 以前，房山还没有一个省市级作家协会的会员。现在已有 15 人加入北京作家协会，其中除几位是近两年入会的较年轻作者，其他十多人无一例外地与《青峰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：或是《青峰》的“三朝元老”，或其处女作刊于《青峰》，或经《青峰》的实验田栽培而走向成功。

所以，不止一个人说过：《青峰》是新时期房山作家成长的摇篮，是新时期房山文学繁荣的奠基石。